

广西社会科学 专家文集

GUANGXI SHEHUI KEXUE ZHUANJIA WENJI

李彦福集

◎ 李彦福著

綫裝書局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

李彥福集

李彥福 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彦福集/李彦福著. —北京:线装书局, 2012. 2

ISBN 978 - 7 - 5120 - 0463 - 4

I . ①李… II . ①李… III . ①少数民族教育—广西—文集
IV . ①G759.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4514 号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李彦福集

作 者：李彦福

责任编辑：赵 鹰 王庐云

装帧设计：张谱丽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010 - 64045283 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17.5

字 数：296 千字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定 价：30.00 元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任 庞汉生

副主任 汤竹庭 许家康

委员 张瑞枝 姚兵 曹平 张流 刘俊
何明 黄学超 巫文强 覃柳琴

主编 庞汉生

执行主编 许家康

副主编 张流 王庐云 马文 梁培林

特邀编审 廖子良 区向明 徐远征

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并从广西的实际出发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推出一大批理论成果,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推动广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深刻认识自身担负的光荣使命,自1984年成立以来,在党委和政府联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方面努力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在开展学术研究和参与重大决策方面努力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方面努力发挥好咨询服务作用,在帮助干部群众增强理论素养和提高理论水平方面努力发挥好宣传普及作用,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把服务社会科学界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把社科联作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家来建设,开展一系列服务社会科学界的活动。总结和整理广西社会科学界优秀专家历年来的理论成果,编辑出版《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就是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领导班子根据社科联的职能作出的服务社会科学界的又一项重要举措。本文集计划收入

约 100 位广西社会科学界优秀专家的理论成果,从 2009 年起陆续编辑出版。

总结和整理社会科学优秀专家历年来的理论成果,对于充分发挥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科学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收录在广西工作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广西优秀专家和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等社会科学优秀专家历年来自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重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果;成果形式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也收入已出版专著的某些章节和调研报告的部分内容,一般每人 1 集,每集版面规模 25 万~30 万字。

收入文集的文章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精选精编;既忠实于原稿,又坚持与时俱进,力求全面体现专家的学术成就和水平,积累广西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文集在专家自选自编的基础上,由文集编委会及编辑工作班子统一组织编辑加工和审稿,送出版社审定出版。

为做好《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门设立文集编委会及编辑工作班子,并得到相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相关专家学者多年来不懈的努力和艰苦探索所创造的丰厚理论成果,为文集的编辑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我们秉持精益求精、宁缺毋滥的原则,认真选编,严把编校质量关,力求使每一本文集都成为精品,但百密总有一疏,在浩大的编辑工作中,难免疏漏和差错,还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目 录

前言 (1)

名家教育思想研究

全面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3)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

——兼论邓小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贡献 (8)

邓小平对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伟大贡献 (18)

李维汉与陕甘宁边区教育 (25)

杨秀峰教育思想研究 (31)

丰碑永存

——徐特立教育思想散论 (39)

雷沛鸿教育思想与广西民族教育 (49)

一代宗师马君武 (56)

开少数民族教育先河的刘介 (67)

教学理论与教育史研究

根据历史科学的特点培养学生智能 (79)

发展广西教育事业关键是转变旧观念 (84)

按新时代需要的人才标准育人 (91)

关于多功能学校建设几个问题的探讨 (95)

要特别注重对瑶族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开发 (106)

重点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革新教学体系	(108)
构建社会化教育体系 开发少数民族人力资源	(11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117)
壮族教育发展概略	(126)
清末维新运动与广西教育	(131)
评1958年教育大革命	(138)
浅论壮族教育发展的分期及其特点	(143)
广西书院的建立和发展	(149)
民国时期的广西壮族教育	(156)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时期的壮族教育	(209)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办好农民教育是发展农村经济当务之急	(219)
民族、边远地区发展农村职业中学的三个关键问题	(222)
浅谈中等职校的办学特色	(225)
论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231)
论民族地区农村职业中学的专业设置和建设问题	(241)
努力提高办学水平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49)
刍议中等职校培养目标的定位	(253)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阶段渗透“职教因素”的实践与思考 ——在自治区第三批支教队会议上的发言	(255)
广西高等职业院校如何应对WTO	(263)
示范性专业建设评估摭谈	(267)

名家教育思想研究

全面公正地 评价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然是我们进行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但他晚年对教育的某些论述也有失误。因此,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考虑到当前国内学者对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教育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持一致肯定的意见,故笔者只想着重就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后关于教育的论述及其教育思想谈一些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要全面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有必要回顾一下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对教育工作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和实践活动。

1. 提出了发展人民教育和改造旧教育的方针 1950年5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教育》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各地根据这一指示,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大力开展识字活动,发展工农业余教育,并努力创造条件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接着,他又提出了“有步骤、谨慎地进行对旧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工作”的指示,各地按这一指示对旧学校实行了接管,并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东西,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实行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从此,教育大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成绩巨大。

题注:原载《基础教育研究》1992年第3期。收入本文集标题有修改。

2. 提出了“三育两有”和“两个必须”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又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三教两有”和两个“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基本原理,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客观规律,其实质主要是规定了我国教育的性质、培养目标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这就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教育目标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教育性质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培养目标上。

问题在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出现了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1958年在学校教育中劳动偏多的现象。但是,不能因此而怀疑乃至否定“方针”的正确性。因为“方针”的本身没有错,只是在贯彻执行中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况且在实践中也不是没有成绩的。比如:各级各类学校都比较注意思想教育工作;高等学校注意“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搞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项目和工程设计;大中小学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师生得到锻炼;学校有较大发展,等等。至于对教育中“左”的影响,党中央从1961年开始也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如制定和贯彻了《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这些条例总结了教育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符合客观规律,使改革的步子更为稳当。毛泽东也十分高兴地说:搞了这几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这也反映毛泽东本人对1958年出现的失误有所认知。

3. 强调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要求全党要管教育 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直接论述不下30次,如果把一些其他谈话、访问中涉及到的有关教育问题的讲话计算在内,就更多了。除提出了教育方针外,他在1957年明确提出:“省、市、县委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允许的。”1958年他在谈到高等学校应抓三个方面的工作时,第一条强调的就是“党委领导”。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1965年8月8日在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时,他说“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究竟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决定。”选任好校长和党委书记,是加强党对学校领导的重要环节。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原则意见是:(1)规定党的教育方针,把住教育的方向;(2)规定各级党委书记都要抓教育,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3)选择好学校领导干部,保证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在

学校工作中的真正落实。“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选拔了许多党的优秀干部充实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领导力量,各级党委都比较重视学校工作,各级学校大都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使党的领导在学校有所加强,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

4. 主张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生动活泼发展的人才这一主张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是他教育思想的精髓。新中国建立后,对于这个问题他更是呼吁得最多。他认为,要让学生在德智体诸多方面都得到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就必须做到:(1)鼓励青年学生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好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力求做到又红又专。(2)鼓励青年人掌握完全知识,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既要向老一辈学习,又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他说: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青的。原因是这些年轻人“方向对”,一抓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3)希望学校要充分兼顾学生的学习和休息。1953 年他就强调要减轻学生负担,增进学生健康,改善伙食。1964 年又提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就成倍增加,这样不行。”^①因此,他要求学校“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4)主张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宜过长。1964 年在春节讲话中,他提出学生负担过重,学制太长,要改造学制,减轻负担。“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问题,“学制要缩短”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教育要“革命”,实践证明,后来走向了反面。(5)要给学生以学习的主权。1964 年他批评说:“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指出:“课程要适当是为了使学生有自由支配课余时间的主动权;讲授得法,考试不能呆读死记,是为了使学生能根据自己的特长,独立思考,发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要求老师要改革教学方法,教师要少讲,让学生自学,多动脑子。他说:“老师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讲的? 教员应该把稿印给学生。有些问题教师要和学生一起商量。”对于考试,他说,学生考试,10 道题,如果都答对了,但答得都很平常,只能及格,如果 9 道题答得不好,一道题答得特别好,有创见就应该打满分。当然,这些话在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但它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一种思想,即考试还是要考的,但要有创造性。至于考试可以“交头接

^① 毛泽东 1964 年 2 月 13 日春节谈话纪要。

耳”的话，就未免有些过头了。（6）主张在实践中学，向工农大众学，毛泽东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但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呢？他主张走向社会，广泛接触工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参加生产劳动，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958年，他曾指出：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所以他要求学生要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1965年12月，他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所以他强烈要求改革教育制度。怎么改呢？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提出了方案：“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个方案，对于促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同时又错误地提出“教育要革命”的口号，并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错误论断联系起来，号召学生发扬“五敢”的所谓“大无畏”精神，起来革命、造反，因而把问题引向了反面。

5. 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希望知识分子有所进步 但他在后来又错误地认为在文化领域内“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导致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本来，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视的，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使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1957年初，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1957年，他还多次提出要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基于这些知识，他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是十分关心的，希望知识分子不断进步，要改造思想，去掉那些头脑里不恰当的东西。

关键在于，1957年的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把我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

的。他过分突出地抓阶级斗争，而且主要靠搞政治运动来开展教育改革。这样，从1957年后，一直是运用所谓“四大”武器对知识分子进行过火的斗争，如1958年的“插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0年又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少慢差费教育路线”，1962年9月，又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从此以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便被错误地理解为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样，1963年又发起批判“母爱教育”，1964年又在部分学校中开展“小四清”，不久又提出了教育领域里有“一条又黑又粗的封资修路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等。这样一来，一方面很多知识分子被批判，而没有受到批判的也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方面“宁左勿右”的思想日益滋长，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但没有意识到“左”的危险性，相反，在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第9条里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和基本情况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样，必然作出错误的决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加上林彪、“四人帮”一插手，教育战线遭到的浩劫更为惨重，他们炮制教育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和作出的荒谬的“两个基本估计”，批判所谓“师道尊严”，抓“马振扶事件”，教育“学大寨”、“学朝农”，等等，使得广大知识分子被批被斗，苦不堪言。后来，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出“老九不能走”，虽也挽救了一批知识分子，但给知识分子留下的阴影是很深的，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同志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的。他的许多精辟的教育论述涵义深刻，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后期所犯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他之所以在晚年犯这些错误，主要是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而造成这一错误估计的主要原因又在于他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听不到群众的声音，加以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使错误更加严重和复杂。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应永远吸取。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

——兼论邓小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贡献

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对于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那种认为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教育思想是“过时”,甚至讥笑为“保守”、“僵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那种把毛泽东教育思想看成是固定不变,不需要再发展了的观点,也是形而上学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学习、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作出贡献。

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根据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实际情況,对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总结了许多新经验,既坚持了毛泽东教育思想,又为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作出了贡献。

1. 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如何认识教育?怎样理解教育同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这是教育观的基本问题,是观察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的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关系决定教育的基本观点,科学地揭示了教育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客观规律,为科学教育观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分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后,得出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论断,强调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同无产阶级政治相联系。毛泽东则根据这些原理,对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作了更为全面和辩证的论述。他在1941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

题注:原载《基础教育研究》1993年第6、第7期。收入本文集标题有修改。

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文化”自然包括了教育在内。在此,他全面揭示了教育同政治、经济关系,并且更加强调了教育对政治、经济的积极反作用。

毛泽东从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出发,一贯强调教育要为革命和经济建设服务。土地革命时期,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解放战争初期,提出了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要求教育同各种经济事业相配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8年,又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

从毛泽东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所谓“可以脱离政治”的教育,“超阶级”的教育,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革命和建设要依靠教育,教育要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应是我们发展经济、发展教育的指导思想。

根据教育与政治、经济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第一次把教育作为战略重点之一来看待,这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最突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就自告奋勇出来抓教育。从1977年5月到1978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7次谈及科技和教育的问题。贯穿其中的一个主要思想就是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考虑教育问题。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①又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②邓小平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的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③

由于科技、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

^{①②③}《邓小平论教育》第24页,50~51页,14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